



参加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的作家们

蜕变与成长中的青春创作

——评论家谈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

□本报记者 明 江

在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协办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10位少数民族青年写作者成为主要研讨对象。他们是照日格图(蒙古族)、苏美嫣(蒙古族)、鲍尔金娜(蒙古族)、陶丽群(壮族)、马金莲(回族)、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陈克海(土家族)、张牧笛(满族)、朱雀(土家族)。这是中国作协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系列研讨的第三次会议。与会的专家学者分别就每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评论,并结合他们各自的创作历程,对每位青年作家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同时,评论家们还就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未来发展、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以及现实生活与写作资源之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乡土的深情与挽歌

在对这些年轻作者进行评论时,青年一代对乡土的倾心描写引起不少评论家的关注。

“我惊讶于一个1979年出生的女作家还会如此倾心地书写乡土,她的年纪接近‘80后’,写作却具备‘70后’作家都不具备的一种老派和安分。在《冬日暖阳》中,她对于耕种节令、农事知识的稔熟,仿佛一名乡镇农技站的技术员。似乎只要给她几亩土地,她立刻就能够劳作起来。”在评论家李美皆看来,陶丽群的写作是一种静水深流式的写作,作为一名壮族作家,她笔下很少出现“民族”元素,她关注的是土地。

在陶丽群的作品《一塘香荷》《漫山遍野的秋天》里,都能看到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会去关注的“原始”生活。而她观照乡土的方式,不是一般地回看乡土,而是依然置身乡土,精神上从未隔断与乡土之间的脐带。她所推崇的,是与土地同质的厚德载物的传统道德,但对于乡村人性和世情的观察,并不为一团和气所遮蔽。

李美皆认为,目前的“80后”、“90后”乡村青年,已经对乡村、土地开始淡漠了。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之间的差别也缩小了。乡村情结很大程度上只是文人的一种文化想象,与现实的乡村已经没有太大的联系。陶丽群的乡土小说,有上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扎实风格,她所书写的是现实的而非臆想中的农村,但她没有能够发掘出新的视角,还是带有一种接近文人的挽歌意味。”也许,执著与保守往往是相伴的,对于土地的执著,导致了观念上的保守。”

1982年生于宁夏西海固的回族青年作家马金莲先后做过农民、教师 and 乡镇干部,早年写作都是手写在旧笔记本上,再修改在稿纸上,然后邮寄。直到考为正式教师,其生活与写作环境才大有改观。

在白桦看来,马金莲的小说,无论是原来的小说集《父亲的雪》还是一些短篇新作如《夜空》《柳叶哨》《老人与瓷》《赛麦的院子》《农师兄》等,写的都是乡土现实、乡人情性,都是“永远的农事”。但马金莲的农事书写,不仅与她所属的“80后”不一样,也与那些比她年长的前辈们不尽相同。“农事”本身并非重点,她多把乡土与农事作为一种环境氛围,主写它们对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制约与滋养,以及它在人的青春成长中烙下的种种印痕。马金莲的小说叙事,大都是童年视角,这种童年视角在以幼稚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同时,还暗含着感恩、自省等多重意蕴。马金莲的小说创作,从视角、人物,到故事、情愫,都是爱心与善意的天然流露,不事矫饰,自然而然。因此,她的小说写作,是不折不扣的根源于爱的乡土童谣。

青年作家的活力与局限

在评论家李掖平看来,麦麦提敏·阿卜力孜,一个从美丽的天山深处走出来的十几岁的学生诗人,在他业已繁多的诗歌创作中,对现代文明、都市生活、庸人精神世界以及主体形而上的孤独倾注了几乎所有的诗情。作为一位还在求学道路上的中学生,麦麦提敏的诗集却名为《返回》,这种“归隐的情怀”引起了李掖平的研究兴趣。

“在麦麦提敏的大量诗歌中,我们看不到他的家乡、民族和异域风光,因为这个介于成熟与非成熟之间的极为敏感的诗人一进入这个世界便被物质的乱象困住了。”返回”,正是诗人想返回内心的澄澈与安静”。李掖

平认为,麦麦提敏的诗歌,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抒情性强,多愁善感本是他这个年龄的诗人的特征。

在分析和肯定了诗人的创作成绩之后,李掖平表示,期待今后能阅读到麦麦提敏充满异域风情的诗行,更期待能读到与天山的雪莲、新疆的少女,以及博尔达峰下苍翠的云杉等相关的诗歌。

冯德华认为,作为一个用汉语创作才两年的诗人,麦麦提敏的诗超越了自身的民族,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怀,他的汉语是有生命有内容有质感的。而她担心的是,年轻的诗人在喧嚣的多元的世界里,会不会丢失自然的独立的感受存在的能力。

新一代的青年诗人写作早、成熟快、视野广,这是评论家们在讨论中普遍谈到的感觉。

翻开1992年出生的朱雀的诗歌写作履历,正可谓开始早、成熟快、写作勤与得奖多。评论家周建军认为,这或许与其自身天赋与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关,也与近年重庆和全国加大扶持年轻诗人成长的大环境有关。

周建军认为,作为重庆本土涌现的具有土家族血统和峡江多元文化浸润的新锐年轻作家,朱雀创作的诗作《阳光涌现》表达的是一种具有童趣的发现。他的诗歌一方面以一种“童心”视角来写童趣发现,却又以理性审视的态度来披露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朱雀的诗歌,小说体现了少年写作如早晨九、十点钟的太阳,有灼热、大气、阳光的一面。虽然其诗歌的土家族特点目前尚不明晰,但长篇处女作《轻轨列车》却体现了巴渝文化的特点。他希望年轻的诗人以后能深入生活,体验民间文化精神,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歌和小说。

评论家郭艳认为,当“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渐渐冷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更为平静的心态来看待这一代人的文学叙事和自我表达。在郭艳看来,1989年出生的青年作家艾多斯·阿曼泰在文学写作上体现出多种文化的交融;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体验、双语的互文实践、寄居地与故乡的对照比较。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艾多斯·阿曼泰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甚至让一些在场评论家感到“遗憾”。13岁开始写诗,18岁出诗集的经历更让评论家感叹。

郭艳却认为,艾多斯·阿曼泰是幸运的:“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哈萨克少年,漂泊在大都市北京,熟练地使用方块字,叙写着现代少年心性无法排解的文学乡愁,以诗歌或小说的名义在浮世中寻找自己最终故乡。”

艾多斯·阿曼泰的生存状况也代表了很多在城市长大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状态,就像郭艳所说,“地域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印迹尚沉睡在我自我表达的情绪里,依然有待待语和更多人生阅历的唤醒”,而且因年纪的关系,他的小说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叙事过于直白,结构上的起承转合不够精细细致等等。

对于像艾多斯·阿曼泰这样的青年作家,郭艳认为,他们应该从青春情绪的书写中走出,进入更为自觉的文学写作。“青春情绪(包括初恋和性欲)可能是最初写作的动因,但是真正的写作必须超越这个层面,进入更为宏阔的写作视域。欧亚大陆板块的土层地理、灾厥语系和汉藏语系的交融汇聚、民族文化在现代转型期的异质性……这些无疑都可以进入作者的文化视域,如何和一个体现代性经验整合从而成就一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需要作者思考。才华对于写作者是必须的,但只有具有和才华相匹配的智识、修养和境界,才能成为大师。”

城市对乡村的回望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青年作家陈克海,近年来小说创作成绩突出,其鲜明的楚巴文化交融写法与现实观照,吸引众多读者和评论者关注。从2008年起,他先后创作了14篇中短篇小说。评论家李鲁平认为,对历史和生活的了解、体验与认知,往往是“80后”以及更年轻的作家所缺乏的。而陈克海出生于湘西鄂西的山村,又求学工作于都市,既有大山生活的经验和历史的积累,也有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体验,这是陈克海独具的创作资源。因此陈克海的小说创作题材领域广泛,有大山里的生活,也有大都市的生活。而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塑造的人物有农民、都市白领、教师、职业干部等,显示了作家对生活的熟悉程度和把握能力。而且作

家关注的人物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贴近每个个体感受的人生体验。这些并非宏大的题材,折射出一个时代在其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鲜活真实的精神血肉。

李鲁平还谈到陈克海小说在叙述语言上表现出的“过渡性”特征,“既不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传统叙事,也不同于当下的网络叙事,只是吸取了当下时尚的、快节奏的、简明的叙述方式,以及网络时代的语言元素”。但他同时谈到,青年作家一定要对网络文化尤其是网络语言的随意性保持警惕。

评论家宋生贵认为,当下的中青年作家中有不少是从农村或牧区、林区进入城市,或由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以自己的努力和才情,以及在写作中以源自故乡的故事与意境获得了城市身份。他们在创作中往往潜在着乡土精神与城市理念的对冲,种种城乡的反差形成了精神游移的空间,作品便是此间寻找精神去向的产物,或是生发于中的内心独白。他们的创作于千差万别中却有着极为相近的指向,那就是怀恋故乡、崇尚故乡、诗化故乡。他认为,从照日格图的创作中即可感受到这样的根性之系,如散文《怀念一垛草》《对话一条河》等。

评论家兴安认为,照日格图的《怀念一垛草》表现了蒙古人质朴真实的生活和命运,让人们细致地体会到劳动中牧人的生活,既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写真,也是人类精神与诗意的吟唱。而其新作《马莲花开》也有很多诗化的细节描写与想象,这只有亲身体验过对故乡和草原保有深厚情感的人才能写出。

时间与经验的等待

兴安5年前曾写过关于鲍尔金娜长篇小说《紫茗红菱》的评论,对她咄咄逼人的才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过一些建议。他把鲍尔金娜的这部长篇定位为是“有问题的小说,而不是平庸的小说,正如这一代人是有问题的一代,而不是平庸的一代一样”。几年之后,与鲍尔金娜同在北京作协当签约作家的兴安又陆陆续续读了她一些短篇小说,发现她的进步是出人意料的,“我甚至能从她的写作看到整体‘80后’的蜕变和成长”。他认为,在鲍尔金娜的《摸黑记》《理发师的演讲》等小说中,其实是把一个无法构成小说的生活片段变成了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个叙事冒险,但是她做得相当出色,从此以后,她可以将任何事情变成小说,并从平凡的生活里找出文学的诗意。

两年前,兴安还把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包括“90后”)称为“外星人”,认为他们无所不能、无所顾忌,令人羡慕。今天,他觉得终于看到他们以往的年轻气盛,开始迷茫,或者正在从迷茫困惑中脱颖而出。“相对我们,他们在孩童时期就可以阅读最好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家还可以比我们更早地接触到外国的最新的翻译作品,或者直接看外文小说,所以他们在阅读和写作技术上并不缺乏,缺的恰恰是时间和经验。这对一个年轻作家的成长非常重要。比如余华,如果没有成名以后几年的迷茫和反思,他就很难写出《现实一种》和《活着》这样的力作。”在兴安看来,现在的青年作家,正在等待时间与经验的积累。

而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很多都市里成长的青年作家,拥有的是一种封闭的经验,不能理解社会的苦难。对人类的境遇关注太少,缺乏有效的写作资源。有些青年作家写作态度也比较自恋。他建议,应该多读经典作品,学会思考理解丰富的生活,而不是只看到自己有限的私人生活,只在意自己的小悲欢。

(摄影:王纪国)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2012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朝戈金在报告中全面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今天处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族文学研究在文化大融合背景下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要保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各民族学者必须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摒弃狭隘的封闭意识,从

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高度,群策群力,形成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和强大凝聚力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伍。他认为,出身少数民族的学术研究者应该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加强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学术对话,不断扩大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在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欠缺,诸如神话、史诗等典型的民间文类,一些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重大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希望从事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上,努力开拓新的学术视野,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努力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共同开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美好未来。

梁庭望在发言中指出,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浩瀚的中华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中华文学重要的动力源泉。每当中原文化圈的文学苦于寻找突破的时候往往能够从其周围的文化圈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得到助力。在这方面,西北文化区的民族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佑夫总结了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对民族文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提出民族文论研究范围和对象应该扩大,要逐步改变宏观研究主要停留在对民族古代文论发展历程描述上的格局,进入对民族文论的文化背景、自身规律、批评方法、概念范畴、内部结构、民汉关系等方面的深入系统的探讨。

钟进文对《格萨尔》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流传变迁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高人雄对匈奴、氐、羌、羯、鲜卑及西域诸民族文学予以梳理,并对北朝盛兴发达的佛教文学的文学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欧阳可憀认为,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述中,文学想象与社会想象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是以复合的形式出现的,构成了文学的“象征形式”。

在分组讨论阶段,专家们在民族文学理论及宏观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学、民间文学及民俗学、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会议期间,与会的部分专家还在西北民族大学、甘南民族学院等院校与青年教师、研究生等举办了专题讲座。

(多洛青)

■视点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大力保护和发

展少数民族文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增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满足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要求“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任务,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坚强决心。

深刻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加大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力度。实践证明,坚持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措施,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发展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云南、贵州、西藏、新疆等地先后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主体、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配套的民族文化法制体系。同时,先后编制、实施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边富民行动、少数民族事业等专项规划,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专门性政策文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与弘扬,我国文化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2003年开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国家先后公布了三批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少数民族项目有515项,占项目总数的42%。截至2011年,热贡文化、羌族文化、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迪庆民族文化、大理文化等5个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获批成立。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下,广大文艺团体和各族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描绘时代风貌、反映群众心声、讴歌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作品,如反映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天府吉祥》(四川)、反映生态环境保护的《藏羚羊》(青海)、反映民族地区发展历史成就的《金色家园》(西藏)等。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各地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深刻内涵和宝贵价值,以民族传统节日、公共文化活动为平台,将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大主题”转化为“小故事”,充分发挥了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作用。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提高少数民族文艺创作水平。创作生产更多的优秀作品,是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各族群众的迫切要求。国家通过实施“五个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文学艺术作品扶持工程、优秀少儿作品创作工程等精品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原创和现实题材创作,扶持代表国家水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优秀艺术精品,积极发展新的艺术样式。经过努力,涌现了《云南映象》《中国·撒拉尔》等深受观众喜爱的舞台精品力作,相继摄制播出《东归英雄》《茶马古道》等一批少数民族题材优秀电影电视剧,诞生了维吾尔歌剧、花儿剧和新城满族戏等诸多新剧种。国家于2006年、2012年举办了两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于2003年、2007年、2011年举办了三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2010年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同时,全国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活动,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生动局面。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保障各族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首先,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加快推进西新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基本建成了功能较齐、语种较全、覆盖面较广的广播影视体系,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均超过90%。目前,民族自治地方有广播电台73座,节目441套,民族语言节目105个;电视台90座,节目489套,民族语言节目100个。其次,加快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少数民族文学出版工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多类别、覆盖面广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如西藏2007年启动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截至目前共投入资金10662万元,建成农家书屋5331个,覆盖92%以上的行政村。此外,民族地区还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疆“百日广场文化活动”、甘肃“千台大戏送农村”、内蒙古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坚持改革创新,深化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民族地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要求,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以增强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为重点推进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云南、广西等地着力打造传媒、影视、演艺、出版发行等国有大型文化龙头企业,建设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积极布局民族文化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印象·刘三姐》(广西)、《印象·丽江》(云南)和《纳西古乐》(云南)、“多彩贵州”等数量众多的民族文化品牌脱颖而出,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需要,也是开拓文化发展空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加大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力度,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整体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凸显。国家每年都安排少数民族文艺团体完成部分重要出访任务,如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在国外举办的中国文化节(节、周)和“感知中国”活动等。中国的少数民族歌舞艺术、服饰表演饮誉世界,并形成品牌,如以展示中国各民族服饰文化、歌舞艺术为内容的重点文化交流项目“多彩中华”,已在国际举办表演和展览活动30多次,累计演出400多场次,对宣传中国民族政策、弘扬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功实践

□丹珠昂奔